

## 《聊斋志异》与清初山东文化生态<sup>①</sup>

### ——以《鬼哭》对谢迁之变的叙述为个案

薛海燕 王大鹏

**提 要** 蒲松龄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灵感植根于清初山东特殊的文化生态。以《聊斋志异·鬼哭》为例,其所反映的谢迁之变是清初山东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而《鬼哭》的取材和描写方式说明蒲松龄不仅关心本土社会现状,而且关注不同社会群体面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立场。小说对来自多阶层的话语形态的展示表现出作家对所处地域文化生态的多层次、多向度性有着富哲理性的洞察。这个看似简单短小的作品能艺术化、文学化地呈现作者的上述现实感悟和哲学思考,故而有其独特的文化含量和文学价值。

**关键词** 《聊斋志异》 《鬼哭》 谢迁之变

学界一直认为蒲松龄一生“徘徊于雅俗文化之间”<sup>②</sup>,有着“对两种文化传统的继承与整合”<sup>③</sup>,但大都语焉不详,尤其是很少有人关注清初山东各阶层、各类型的文化在《聊斋志异》中的具体呈现。本文试图以《聊斋志异·鬼哭》为个案,研究蒲松龄的创作与清初山东特殊的文化生态之间的关联。

《鬼哭》以发生在顺治四年(1647)的谢迁之变为背景。谢迁之变是清初淄川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也是山东抗清斗争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本文之所以选择这则故事,不仅因为谢迁起义的规模和影响较大,更考虑到这一事件发生在蒲松龄的故乡,后者的不少长辈和亲友对这次民变都有具体的应对举措或言论。故拟以此为个案,从选材取向和描写方式等角度考察蒲松龄的创作与具体的社会背景、文化生态之间的联系。《鬼哭》篇幅短小,为便于分析,兹录全文如下:

谢迁之变,宦第皆为贼窟。王学使七襄之宅,盗聚尤众。城破兵入,扫荡群丑,尸填堦,血至充门而流。公入城,打尸涂血而居。往往白昼见鬼,夜则床下磷飞,墙角鬼哭。一日王生皞迪寄宿公家,闻床底小声连呼:“皞迪!”已而声渐大,曰:“我死得苦!”因哭,满庭皆哭。公闻,仗剑而入,大言曰:“汝不识我王学院耶?”但闻百声嗤嗤,笑之以鼻。公于是设水陆道场,命释道忏度之。夜抛鬼饭,则见磷火荧荧,随地皆

① 本文为山东省2006年全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聊斋志异》与清代山东文化生态研究”(批准号200602007)结项报告的一部分

② 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第4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③ 张稔穰:《蒲松龄对两种文化传统的继承与整合》,《蒲松龄研究》2000年第3、4期合刊。

出。先是,閤人王姓者疾笃,昏不知人事者数日矣。是夕,忽欠伸若醒,妇以食进。王曰:“适主人不知何事,施饭于庭,我亦随众啖噉。食已方归,故不饥耳。”由此鬼怪遂绝。岂钹铙钟鼓,焰口瑜伽,果有益耶?

异史氏曰:“邪怪之物,惟德可以已之。当陷城之时,王公势正烜赫,闻声者皆股栗,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终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犹不可以吓鬼,愿无出鬼面以吓人也!”

故事的主要内容不是具体的民变或镇压过程,而是事件过后“贼”、“宦”双方如何取得最终的相安无事。如何才能相安无事?故事最后,在镇压和恐吓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王学使为亡魂超度,才使后者离开了自己的宅第。而他为什么为亡魂超度?故事告诉我们,是因为他听到了亡魂的声音。小说写“一日王生皞迪寄宿公家,闻床底小声连呼:‘皞迪!’已而声渐大,曰:‘我死得苦!’因哭,满庭皆哭。公闻,仗剑而入,大言曰:‘汝不识我王学院耶?’但闻百声嗤嗤,笑之以鼻。”鬼哭由“小声”而渐大,至“满庭皆哭”,而王昌荫的“大言”则在众鬼的“嗤嗤”笑声中显得很荒唐,很苍白。

这简直是直观呈现了“贼”与“宦”之间“话语”的对抗。我们不能确切判断蒲松龄这种奇妙的构思来自何处,可以肯定的是,有关谢迁之变,不同阶层确有不同的态度和声音。

《清史稿》卷四“本纪第四”载:“庚戌,山东贼谢迁攻陷高苑,总兵官海时行讨平之。”清《淄川县志》记载稍详,卷三“兵事”条载:“国朝顺治四年六月壬午,高苑贼谢迁先伏贼城内,夜半垂绳引贼上,城遂溃。迁见城坚,据之。号召东山羽党数千入焉。大兵旋集,凿长濠围之。凡两月,从地道引火轰城,城崩,贼始歼。”卷三“续兵事”:“顺治四年,土寇谢迁陷城以后,距今百年矣。淄川父老目不见兵戈,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老寿终,孤而颂声作焉。”

清《高苑县志·灾祥》亦载:“高苑民谢迁造反,占据刘家镇”,于十一月攻克高苑县城,“杀知县武振华。”

《清史稿》及各地县志所载,重在事件的陈述,基本立场则是以官方镇压者的姿态炫耀武功。其中《清史稿》对此事的粗陈梗概流露出些许轻视的态度,地方县志的描述则相对细致,肯定甚至夸大了这次起义的规模声势。《淄川县志》对兵事的记述在字里行间还体现出对黎民的关注,这自然与地方官员、方志纪录者直接面对本县民生有关。当然,尽管存在如上差别,史志的总体态度都是将谢迁义军看作一般的反叛逆贼而已。

那么民间普通民众又怎样看待谢迁之变呢?他们的态度与官方可有差别?据传说,谢迁曾在“淄川韩氏”之明末高官韩源家作仆人,后因事与主相左、有隙,离开韩家。后淄川城破,韩家深受其害。可见普通民间更为热衷传播诸如报应、复仇等类型的故事。

有关谢迁之变危及韩家这件事情,著名书法家王铎(1592—1652)为韩源的长媳贾氏所撰的碑文是这样记述的<sup>①</sup>:

清贾氏,淄川儒生士鹏女,吏科给事韩源长子茂椿妻。……以孝闻。丁亥六月十四日,谢迁攻淄川,椿肄业山中。贼众斫门,大声震动。贾氏掖姑胡氏入一园,伏匿蒿翟中。……贼欲褫其衣。贾益誓曰:“头可截,衣不可褫。”握发伸颈触贼,遂遇害。年四十四岁。贼忽目眩顿足,投刀大叫曰:“可惜!杀此贤孝妇人也!”贼因谓胡孺

<sup>①</sup> 碑文斑驳,兹抄录其中可辨识者。

人曰：“吾见人多矣！如汝妇之刚果者，实寡。死而保汝，吾何难舍汝姬耶。”又贾氏之媳孙氏于此时亦烈死云。孟津王铎撰。

王铎仕清后被授以礼部尚书之职，韩源时任吏科都给事中，又多次受到顺治褒奖，以二人同为“贰臣”的身份，王铎为韩源死于乱中的家眷撰写碑文，贬斥乱军为“贼”而褒扬死难者贾氏的临难不苟，自不足怪，但当时一些不愿仕清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又有不同。

谈迁（1594—1658）《北游录·纪闻下》“辨发”条曾记载这样一则故事：谢迁义军破城后，用锥子遍刺淄川显宦孙之獬（约1591—1647）身体，插上头发，恨声不绝地骂道：“我为汝种发！”孙之獬自知众怒难犯，已无活理，遂破口大骂。义军将其口缝上，凌迟而死，还把他在城中的孙子、曾孙杀了个干净。这一事件的缘起在王家桢的《研堂见闻杂记》中记述甚详：

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人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

由此可见，不少知识分子关注的是夷狄之别，具体到“杀孙之獬”这一事件，关注的是其积极迎合鼓吹的“剃发令”所带来的汉人之耻，而后者正是清初民族矛盾丛生，民族文化冲突背景中的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明乎此，则不难理解作为抗清阵营主要代表人物的顾炎武（1613—1682），在听到淄川被攻陷后曾高兴地作了这样一首《淄川行》：

张伯松，巧为奏，大纛高牙拥前后。罢将印，归里中，东国有兵鼓逢逢。鼓逢逢，旗猎猎，淄川城下围三匝。围三匝，开城门，取汝一头谢元元。

这样的表述无异于直接将谢迁之变的动机阐释为“取汝一头谢元元”，阐释为抗清斗争，为之鼓吹赞颂。而就前文所列举的《清史稿》及县志所载看，史志并没有渲染（或曰刻意过滤了）这次民变中所可能包含的民族矛盾的有关信息。

从上文分析来看，在不少知识分子眼中，谢迁的义军也是一个复仇之师，不过与民间传说所关注的个人恩怨相比，前者所褒扬的复仇毋宁是在文化层面的一种报应和反抗。当然，时值异族当政，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抗不仅属民族斗争范畴，也携带了以下（民间）抗上（官方）的政治斗争含义。如《研堂见闻杂记》所述，“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就强调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角力。知识分子立场与民间立场，在这种特殊权力格局中比历史上其它时期更呈现出一定的相互交融关系。

由此可见，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各阶层对谢迁之变的记载阐释不尽相同，不同话语的交响呈现出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角力的状态。蒲松龄崇祯十三年（1640）生于淄川，顺治丁亥（1647）时年八岁，对谢迁之变不知是否有深刻记忆。《淄川县志·卷十》“三续隐逸”记载，明末农民起义波及山东，蒲家庄地处通往县城的孔道，蒲松龄的父亲蒲槃（？—1664或1669）曾与弟祝“擘画守村，条理井井，且曰：‘人孰不畏死！非重赏孰敢与贼战者；不能战，焉能守？’乃出钱百贯，会众村南枣树下，悬贯满树，曰：‘杀一贼者予若干。’由是，壮者争出战，淄邑城守倚以为援。”清顺治丁亥，蒲槃又曾组织村中老少抵御谢迁军的进犯。作为一位在野的汉族知识分子，蒲槃为什么要抵制谢迁军呢？

我们分析,蒲槃对谢迁军的态度之所以与顾炎武等不同,这跟动乱发生的地点就在自己的家乡有关。事实上,不仅蒲槃,有些同乡的其他文人也因曾亲历亲睹(或因本族前辈曾亲历亲睹)谢迁军搜刮报复士绅阶层的暴力手段,对这场民变了无好感。如王培荀(1783—1859)的《乡园忆旧录》卷四记载,民变中淄川“血流井中,至不可饮。张氏被害最酷,一门三烈”。据王士禛(1634—1711)《带经堂集》卷七十九《明经张先生传》及《淄川张氏族谱》、《高氏族谱》、《韩氏族谱》等记述,当时张氏等大族被迫出重金赎人,从此败落不振。面对剥夺有产阶级生命财产的民变,无论出于阶级感情还是人道精神,文人所表现出的反感乃至抗拒态度都属于类似情况下的常态。正如我们刚才所说,顾炎武等之所以盛赞这次民变,渲染其反清色彩,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立场与民间立场在这种特殊权力格局中比历史上其它时期更呈现出一定的相互交融关系。

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中多次讲述与抗清活动有关的故事,他是否曾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顾炎武于明亡后四处游走,从顺治十四年(1657)初入山东,其后二十年间屡屡在山东逗留,并且曾隐居在今淄博境内白云山下,此地距淄川路途很近<sup>①</sup>,但没有资料证明蒲松龄的长辈及其好友与顾炎武之间有直接交往,年龄小得多的蒲松龄与顾炎武或其它反清人士之间更没有交往纪录可查。虽然蒲松龄可能没有直接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但他对谢迁之变的态度还是与他的父亲不同。如前文所言,尽管在《鬼哭》一文中蒲松龄称谢迁军为“贼”,但从字里行间看,他对谢迁军并非深恶痛绝。小说写到后者遭到镇压,无名亡魂倾诉“我死得苦”,笔触中流露出悲悯的情绪。

小说中写到的冤魂们的倾诉对象——学使王七襄,他的六弟王永印是蒲松龄设帐生涯中的东家之一。《淄川县志》卷五“选举志”载:“王昌荫,字七襄,明崇祯十年进士,授固始知县。清兴,起户部主事,擢福建道御史,巡按山西,提督北直学政。”。后来如何,并无下文。而《鬼哭》文末介绍此人“不令终”。袁世硕先生分析,王昌荫是顺治六年四月由福建道监察御史调顺天学政,而顺治六年四月云南道监察御史朱鼎延便继任为顺天学政,王昌荫的去职应当在前此不久。“《清实录》未载。……王昌荫有可能是在顺天学政任上因得罪而致死,故诸方志均不便言之”。<sup>②</sup>注《聊斋志异·鬼哭》文末借“异史氏曰”交待王昌荫这个人物“不令终”,已成为目前所见的能提供考证这个人物生平完整信息的唯一线索。

正如《鬼哭》开篇所言,“谢迁之变,宦第皆为贼窟”。蒲松龄的不少好友,如张笃庆(1642—1715)等都在乱中“美产冰消,旧业瓦解”。<sup>③</sup>而他独独选择王昌荫作为冤魂的倾诉对象,恐怕是因为斯人已逝,且系“不令终”,方便作者讲述一个通篇“鬼话”却暗藏玄机的故事。

故事始自“谢迁之变,宦第皆为贼窟,王学使七襄之宅,盗聚尤众”,继而述及“城破兵入,扫荡群丑,尸填堙,血至充门而流。公入城,打尸涤血而居”,占领被占领、征服被征服的关系出现了两次逆转。文末言“出人面犹不可以吓鬼,愿无出鬼面以吓人也”,“人”“鬼”的命名又借助偷换概念呈现出反转关系。这样,全篇中“聚”与“破”、“烜赫”与“不

① [清]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粤雅堂丛书》第18集。

② 袁世硕:《蒲松龄生平著述新考》,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44页。

③ [清]张笃庆《厚斋自著年谱》,转引自崔国光、贾秀丽:《厚斋自著年谱》,《薄松龄艳而不俗》,2001年第4期。

令终”、“人”与“鬼”等二项之间都相互对立而统一,共同营造出反讽的张力,令人联想到“贼”与“宦”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也同属此类。即便“贼”与“宦”二者的定位在具体历史语境中不容颠倒,他们之间也需要相互的对话和妥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相安无事。这样的认识显然已经超越了站在某一具体阶级立场为谢迁军定性为“贼”抑或义军的层次,而具备了哲理反思的高度。很难确知蒲松龄对谢迁之变的哲理性认知来自何处,但可以看到蒲松龄友人张笃庆追忆自己家族曾惨遭乱军和官方双方面迫害的文字,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蒲松龄的艺术灵感还是以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现实为依据的:

先是,城中有诸无赖贵游子弟及数十恶少年,行不轨,导贼夜入城,城遂溃。谢贼盘踞城池,为强掳计,欲饱而颺耳,不意青、济二郡大兵陆续围城,继而都统率满兵、守台监军皆至,贼如游釜中,不得出。然淄城创修未久,坚完高峻,城中粟米、守御之具皆备,贼遂胁居民守城,图存苟活。……吾家七叔祖,与贼党丁可泽有夙怨。丁入城,叔祖被执,骂贼不屈死。吾家余皆闭门静守,无见害者。及官军用火破城平贼,吾家以不从贼,为监军道张公尚察明,曲赐矜宥。……

先是,有益都山寨,曰鹿角山。明季,伯祖奉上命创修,以避乱者。至是为土寇占据,遂有势宦垂涎吾家,欲借端下石,以窝隐剧贼诬陷吾家,彼则居间吞噬,居援手功。十二月,先拘世父绵,系请室。既而并逮两叔祖及老父与诸叔,盖绝流计也。……时吾家尽力营救,各罄所有,赂当事,冤始得解。

据文中记述,谢迁军本不打算长期占据淄川县城,被官军包围,才不得不据城以守,给城中居民带来了巨大困扰。而乱军被镇压后,淄川居民又因曾受胁迫守城或宅第曾被乱军征用,而为摆脱“附逆”罪名付出惨重代价。“贼”与“宦”二者谁为祸更烈,谁的行为更缺乏正义性,借助这样的记述将殊难判明。不知为了规避政治风险,还是出于艺术考虑,蒲松龄在《鬼哭》中没有实录类似经历,而是以王学使家在乱中失而复得的宅第为场景,以无名之贼的亡魂和最终也“不令终”的王学使为主角,符号化地展示了命运的无常,及所谓的尊卑、是非等价值判断面对这种无常所暴露的苍白。值得称道的是,上述抽象的哲理认知,借助小说所构思的“贼”与“宦”之间的话语对抗而显得直观可感。小说中亡魂的声音由小变大,王学使的声音则由大变小,很有层次,张弛有度。当然不能据此简单将蒲松龄视为群众的代言人,但毋庸置疑,《鬼哭》描写了以声音为载体的社会矛盾和斗争,这显然是一种了不起的社会洞察力和文学想象力,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创获。

总之,对比《鬼哭》和上文提到的各种文献,前者可能是有意淡化了谢迁之变的反清色彩,甚至是回避了事变本身,而只是将之作为故事背景出现。清初山东的民族矛盾及清廷的高压政策,确实都对蒲松龄的取材和描写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蒲松龄虽然可能受父辈影响和迫于文字狱的压力,在小说中称谢迁军为“贼”,但对这次民变的认识却已经逸出为之定性的社会学层次,进入了哲学反思和美学观照的领域。从这一个案来看,蒲松龄不仅关心本土社会现状,而且关注不同社会群体面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立场。小说对来自各阶层的多种话语形态的展示显示出作家对所处地域文化生态的多层次、多向度性有着富哲理性的洞察。这个看似简单短小的作品能艺术化、文学化地呈现作者的上述现实感悟和哲学思考,故而有其独特的文化含量和文学价值。

(作者通讯地址:薛海燕 王大鹏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 266100)

(责任编辑 晓 宁)